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

施萍婷 著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

施萍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 / 施萍婷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2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主编.)

ISBN 978-7-308-15176-4

I. ①敦… II. ①施… III. ①敦煌石窟—研究
②敦煌学—文献—研究 IV. ①K879.214 ②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7031 号

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

施萍婷 著

出品人	鲁东明
总编辑	袁亚春
丛书策划	黄宝忠 宋旭华
责任编辑	胡 畔
责任校对	张小苹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344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176-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总 序

浙江,我国“自古繁华”的“东南形胜”之区,名闻遐迩的中国丝绸故乡;敦煌,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便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会”。自唐代始,浙江又因丝绸经海上运输日本,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浙江与敦煌、浙江与丝绸之路因丝绸结缘,更由于近代一大批浙江学人对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传播、弘扬而令学界瞩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荣昌盛,学术底蕴深厚,在时代进步的大潮流中,涌现出众多追求旧学新知、西学中用的“弄潮儿”。20世纪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流散而兴起的“敦煌学”,成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者首先“预流”者,即是浙江的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导夫先路”,几代浙江学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奋随其后,薪火相传,从赵万里、姜亮夫、夏鼐、张其昀、常书鸿等前辈大家,到王仲荦、潘絜兹、蒋礼鸿、王伯敏、常沙娜、樊锦诗、郭在贻、项楚、黄时鉴、施萍婷、齐陈骏、黄永武、朱雷等著名专家,再到徐文堪、柴剑虹、卢向前、吴丽娱、张涌泉、王勇、黄征、刘进宝、赵丰、王惠民、许建平以及冯培红、余欣、窦怀永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学术追求,也有各自的学术传承与治学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学科园地辛勤耕耘,为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发展与丝路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者,成为国际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研究领域举世瞩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群体。这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始创于 1897 年的浙江大学,不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渊藪,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英才辈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贯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而又敢于创新的学者专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的浙江学人而言,不仅相当一部分人的学习、工作与浙江大学关系紧密,而且每每成为浙江大学和全国乃至国外其他高校、研究机构连结之纽带、桥梁。如姜亮夫教授创办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4 年受教育部委托,即在全国率先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培养了一批敦煌学研究骨干;本校三代学者对敦煌写本语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浙江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精诚合作,在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为敦煌石窟艺术的鉴赏、保护、修复、研究及再创造上,不断攻坚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原语言文学分会基础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也已经成为与甘肃敦煌学学会、新疆吐鲁番学会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术平台。由浙大学者参与主编,同浙江图书馆、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编撰的《浙藏敦煌文献》于 21 世纪伊始出版,则在国内散藏敦煌写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领跑与促进的作用。浙江学者倡导的中日韩“书籍之路”研究,大大丰富了海上丝路的文化内涵,也拓展了丝路文化研究的视野。位于西子湖畔的中国丝绸博物

馆,则因其独特的丝绸文物考析及工艺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优势,并以它与国内外众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享誉学界。

现在,我国正处于实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起步阶段,加大研究、传播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这对于今天的浙江学人和浙江大学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如何进一步传承、发扬学术优势的问题,也是以更开阔的胸怀与长远的眼光承担的系统工程,而决非“应景”、“赶时髦”之举。近期,浙江大学创建“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的坚实步伐。现在,浙江大学组织出版这一套学术书系,正是为了珍惜与把握历史机遇,更好地回顾浙江学人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历程,奉献资料,追本溯源,检阅成果,总结经验,推进交流,加强互鉴,认清历史使命,展现灿烂前景。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委会

2015年9月3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所选辑的论著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学科范围较广,引述历史典籍版本较复杂,作者行文风格各异,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历史、尊敬作者、遵循学术规范、倡导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经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协商,书系编委会对本书系的文字编辑加工处理特做以下说明:

一、因内容需要,书系中若干卷采用繁体字排印;简体字各卷中某些引文为避免产生歧义或诠释之必需,保留个别繁体字、异体字。

二、编辑在审读加工中,只对原著中明确的讹误错漏做改动补正,对具有时代风貌、作者遣词造句习惯等特征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历史地名、族名等称呼,只要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一般不予改动。

三、对著作中引述的历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处明确,核对无误,原则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动。原著没有注明版本出处的,根据学术规范要求请作者或选编者尽量予以补注。

四、对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鲁番所出古写本,一般均改用通行的规范简体字或繁体字,如因论述需要,也适当保留了

一些原写本中的通假字、俗写字、异体字、借字等。

五、对著作中涉及的书名、地名、敦煌吐鲁番写本编号、石窟名称与序次、研究机构名称及人名,原则上要求全卷统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体现时代特色或学术变迁的,可括注说明;无法做到全卷统一的则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书系编委会

目 录

代序 我与敦煌学研究	(1)
------------------	-----

敦煌石窟研究

敦煌与莫高窟	(9)
--------------	-----

建平公与莫高窟	(37)
---------------	------

关于莫高窟第 428 窟的思考	(44)
-----------------------	------

莫高窟第 220 窟新发现的复壁壁画	(71)
--------------------------	------

读《翟家碑》札记	(83)
----------------	------

奇思驰骋为“皈依”

——敦煌、新疆所见须摩提女因缘故事画介绍	(106)
----------------------------	-------

敦煌经变画	(114)
-------------	-------

中国最早的无量寿经变

——读支道林《阿弥陀佛像赞并序》有感	(151)
--------------------------	-------

新定阿弥陀经变

——莫高窟第 225 窟南壁龕顶壁画重读记	(170)
-----------------------------	-------

金光明经变研究	(182)
---------------	-------

敦煌文献研究

本所藏《酒账》研究	(229)
-----------------	-------

敦煌历日研究	(258)
--------------	-------

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	(319)
俄藏敦煌文献 Дх.1376、1438、2170 之研究	(348)
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庙写本源自藏经洞	(365)
法照与敦煌初探	
——以 P.2130 为中心	(374)
本所藏敦煌唐代奴婢买卖文书介绍	(405)
延祐三年奴婢买卖文书跋	(412)
敦煌遗书题记隋董孝缵写经考略	(420)
S.2926《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写卷研究	(430)
附录 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451)
后 记	(459)

代序 我与敦煌学研究

1961年,我到敦煌工作,时年29岁,虽将步入30,却没有“三十而立”之雄心,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名1956年入大学的“调干”学生,入学后经历的是多事之秋,恰似“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孩子,故“立”不起来。但有一点至今无悔——到敦煌以后,没有想走。那是因为跟着段文杰先生看了一个星期的洞窟以后,觉得莫高窟的研究课题俯拾皆是,有一辈子也做不完的事,我就答应常院长(其时常书鸿先生是兰州艺术学院的院长兼敦煌文物研究所所所长)到敦煌来工作,这一步走对了。

光阴荏苒,一晃40多年过去了,如今已垂垂老矣,还没有“立”起来。我很害怕填表,万一要填专业是什么,我无言以对。敦煌学博大精深,有学者给敦煌学分类,拟了100多个分支。就敦煌学大的领域而言,有敦煌艺术、敦煌文献、石窟保护等,哪一门我都不通。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干部、50年代的党团员、50年代的大学生,日本友人称之为“三五牌”的人才。我不在“人才”之列,却是典型的“三五牌”。在敦煌研究院(过去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我做过资料工作,与史苇湘先生几次互为组长、组员;到石窟考古组当过“没有受命的组长”;到敦煌遗书研究所当过不称职的所长。其间,作为一枚螺丝钉,当过多年的讲解员、资料采购员、编目员,编过书,筹备过出国展览,外带“文革”十年的放羊、种地。只顾耕耘,不问收获,晕晕乎还觉得没有偷懒。20世

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纷纷出书,同行们左一本、右一本馈赠我各自的专著。接过好友的书,高兴的同时脸上总是热乎乎的——因自己没有专著可以回赠而愧疚。

为了自我解嘲,我自称是敦煌学领域的“两栖动物”。青蛙在水里、陆地都能生存,但在水中,潜得不深,在陆上,蹦得不高。传统的敦煌学分为两大领域,即敦煌艺术研究和敦煌文献研究。敦煌石窟考古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重要一环,我在这方面写过一些东西。在敦煌艺术海洋里,潜得不深,但还能生存。敦煌写卷内容考证,是敦煌文献研究的基础,电脑没有普及之前,我利用法国、英国、中国几个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做过多年的内容考证、定名工作,编过目录,也写过一些东西,在这广袤的领域也能蹦跶两下,但自我感觉是没有什么高度。我想,我为自己定位的“两栖动物”,不用多费笔墨,读者只要翻开本书的目录,便可一目了然。

把自己比作“两栖动物”是不好听的。为什么我会这样?一是环境使然,一是天性使然。“三五牌”的大学生是有点“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味道的。这种大环境,再加上我较能随遇而安,“成就”了我这只“青蛙”。

至于“天性使然”,这得说上几句。

鲁迅曾经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是啊,你看那海绵吸水,在达到饱和状态之前,对于来水总是那样迫不及待的。我生性比较好奇,兴趣比较广泛,总觉得每天都能长一点知识,也就没有白活。正因为如此,目的性不强,经常在书库里东翻翻西翻翻地过一天。

这反映在我写的文章上,比较典型的的就是《敦煌历日研究》一文。敦煌研究院藏有晚唐以后敦煌归义军官方的酒账一件,账

日有月有日,而不知是哪一年。但在某月至某月之间有“两个月小尽”或“三个月小尽”的说明。20世纪70年代初,武汉大学的朱雷先生来敦煌考察,我向他请教中得知“月小尽”即小月。于是我就想,若能把酒账提供的大月、小月与古历对照,不就能为酒账的立账年代找出线索了吗?

由此而首先想到敦煌遗书中的“敦煌历日”。待到把有关的敦煌写卷拿出来认真一看,名词不懂,推求术不会,真有“老虎吃天无处下爪”之窘。不过,兴趣因此而倍增。于是,从阅读日历知识开始,接着读《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说来惭愧,学历史的人,看不懂正史中的任何一种律历志。读不懂律历志就改读《梦溪笔谈》《陔余丛考》《小学绀珠》等唐宋史料笔记,有了一点“理还乱”的知识。此时,我想到了从敦煌历日中找规律的方法,把缩微胶卷中所有敦煌历日残卷印成照片,在王重民先生《敦煌本历日之研究》(《东方杂志》第34卷第9号)、日本学者藪内清《斯坦因敦煌文献中的历书》(《东方学报》京都版第35期)两文的启发下,将历日内容进行整理、排比,尽量利用残卷所提供的条件,恢复该件的月建大小,然后与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对照,将有年代的历日写卷与《二十史朔闰表》对照,学着使用“年九宫”“月九宫”,知道什么叫“建除十二时”。

1983年春天,张广达先生给我寄来了著名敦煌学者藤枝晃先生的《敦煌历日谱》(《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5期)。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文章。当我摸索着用多种办法来推求每件历日所属年代以后,将我的结果与王重民、藪内清、藤枝晃诸先生的推算一对照,发现我的推算居然可以补他们的不足,甚至有所突破,信心因此而生,文章也就写出来了。

成果出来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曾告诉我,他去美国讲学还用了我的历日资料;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也曾几次给我发来该所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我自知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一次也没有出席过,只是尝到了兴趣所带来的甘甜而已。《敦煌历日研究》一文发表以后,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一位好友指出了我在“建除十二时”上立论有误,同时给我寄来了《中国天文学史》第3卷1册,我如获至宝。如果早有此书,我的历日研究将是事半功倍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到“隔行如隔山”,以后应少干一点兴之所至的事。

我把此书名为《敦煌习学集》,也有一个缘由。

若干年以前,读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论及兵制时,陈先生引用了南宋叶适著《习学记言》中的一段话,除了深深佩服陈先生博学多闻、引证恰当之外,对《习学记言》这一书名印象颇深。诚然,习学犹学习,但我主观感觉“习学”有一种深层次的含义。当时,我不敢有出版什么文集的奢望,只想到在我辞世之前把自己的习作收拢一处,题目就叫《敦煌习学集》。在我来说,“习学”还有另一种意思。刚到敦煌时年纪尚轻,我心想敦煌学虽博大精深,但来日方长,不妨样样都学习学习,日积月累,总会做出点成绩的,因此起点就不求专而求广。谁曾想三年一个小运动,五年一个大运动,更有“文革”十年,再加上自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时光不再,只有空叹息而已矣。几十年来写的一些不像样的文章,只能说明我在不断地学习,故而文集最贴切的名称莫过于《敦煌习学集》。

有人说,文章犹如癞头儿子——自己的好,我却不然。我的心态是,刚脱稿时,看上一遍,自觉不错,过一阵子,就不想再看,好赖随它去。因此文章发表以后,懒得再看,是否有硬伤也不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后,敦煌学界出书已不再是“难于上青天”了,出版社的朋友曾热情地提议为我们夫妇出书。朋友的好意,我永生难忘,但在感激万分的同时,坦诚地推辞了。其原因是:要

出文集,得东三西四地收集文章,得从头看一遍,得改正错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而垂暮之年的我,总想趁脑子尚清晰之时再写点新东西,不说是把过去的损失挽回,至少能让日子过得充实一点。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

今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 60 周年,院里将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院领导为我们安排了文集的出版,偏又碰上自己身体不适,没能把所收文章从头看一遍,绝大多数文章一仍其旧,尤其是注解部分,当年不讲究规范化,此次又未能重做。凡此种种,只有告罪于读者,祈请见谅并多加批评指正。

施萍婷

2004 年 6 月 26 日于兰州

(本文原为《敦煌习学集》自序,原载《敦煌习学集》上册,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版)

敦煌石窟研究